

陳文敏「關注組」賊喊捉賊

□李文生

【讀者來稿】

港大畢業生議會今晚開會，屆時將討論兩項由反對派政客發起的動議，包括要求校委會三十天內需任命副校長、取消特首擔任大學校監等。或許是懼怕最終投票結果不利於自己，反對派連日來發動「抹黑」戰術，指另一批校友會借「授權票」去造勢贏得結果。這是反對派慣用的賊喊捉賊伎倆，不僅達不到目的，更只會讓校友看到政客的心虛。

抹黑校友 不擇手段

由於畢業生議會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組織，固然有章程與嚴格的組織核心選舉，但有權就「動議」作出投票的，則包含了幾乎所有港大畢業生、教職員，據稱人數有多達十六萬之巨。對於反對派來說，要保陳文敏「上位」，則先要成功騎劫畢業生議會，以此來脅迫港大校委會作出任命決定。因此，這批反對派政客兵分兩路，一路是發動所有力量去鼓動支持者投票，同時更是千方百計去取得「授權票」，以先下手為強，封殺對手；另一路則是發動「抹黑」戰，攻擊持不同意見的校友「造票」、「騙票」。正如市民所見，反對派政客還「煞有介事」地舉行記者會，將自

己塑造成一個弱者形象，意圖借此來爭取港大校友的同情。

然而，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一直都是反對派。「佔中」的肇因暫且不說，煽動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會議，亦是反對派政客；而此次畢業生議會的特別大會，同樣是受反對派要求下舉行。所有事件都是這些政客製造出來，如今竟然還要指責持不同意見者，這與賊喊捉賊有何區別？

事實上，一如輿論所言，「特別大會」之所以會出現，與某些政黨的操縱密切相關。尤其是在上月初港大校委會遭暴力衝擊之後，一些政治勢力畏於民憤，改變策略，圖以通過所謂的動議去「騎劫」畢業生集體意志，形成民意「假象」，進而向校委會施壓、強推陳文敏提升為副校長。儘管有些政客是港大校友，但其真正的目的並非以港大最大利益出發，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計。

但別以為這種「抹黑」手段可以達到目的，港大校友對事件有自己清晰的看法，又豈會受這種政治伎倆所左右？但將這種對付政敵的骯髒手段，拿來對付港大校友，還能說是「愛」港大的表現？當他們喊得越大聲要「維護港大自主」之時，恰恰是最用力去破壞港大的做法，令人所不齒。

隆重紀念抗戰勝利乃必須

□洛 君

【港事港心】

好些港人不明白，抗日戰爭距今七十年了，戰事逐漸遠去，內地為何仍然隆重紀念？這裡牽涉到：一、反對派和「港獨」分子中不乏「媚日」的人，抗拒內地，不斷惡意攻擊一切與內地有關的事情；二、一些港人不讀歷史，不明理，自是易受反對派挑撥離間。

這裡要說幾點：一、紀念本身的意義所在，二、紀念活動中閱兵深具啓示，三、「仇恨是上一代的事」之說不成立。

很多事情都可以拿來紀念，戰爭的紀念雖然是特殊的紀念，目的是提醒人民緬懷先烈、汲取戰爭的教訓，但一般毋須特別隆重。新中國過去參與過幾場戰事，那是關乎意識形態，是價值觀的問題，除了打仗，還可以透過談判、溝通解決，敵我的爭拗可以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抗日戰爭比其他一般戰爭更具特殊性，它是反抗侵略的戰爭，日本軍國主義者掠奪中國的土地、資源，這場戰爭便不能透過談判和溝通來化解，只能抗戰到底。

取消電車建議荒謬

□立法會議員

鍾樹根

【議會內外】

近月港島發生三件牽涉舊事物、廣受市民關注和富爭議的事件，包括半山般咸道四棵生於石牆的百年榕樹因出現危險而被砍掉，灣仔有80年歷史的三級歷史建築同德大押面臨拆卸，連擁有111年歷史的電車，也被質疑是引致中區塞車的「元兇」，有人向城規會建議取消中環至金鐘一段。

姑勿論是否同意上述三件事的理據或處理方式，但從正面來看，港人對本土懷舊事物的眷戀和執著，反映出他們對香港具有歸屬感，令人欣喜；而筆者作為港島區的議員、兼長年居於港島的「港島人」，對上述三件事物也有深厚感情，看見古樹和古建築物一一消失，心裡也不是味兒。不過，從理性來看，保育與發展必須取得平衡，雖然有人希望同德大押可列為暫定古蹟，以避過拆卸厄運；但我們也必須在尊重私有產權、市區更新和公帑善用原則之間，無奈地作出權衡並取捨。

而在電車存廢的問題上，相信香港超過九成九的市民都支持保留電車，原因十分簡單，因為電車是香港的標誌，極具歷史價值，富有本土情懷，而且價格便宜，故吸引到不少遊客和基層市民乘坐。事實上，電車除了具備歷史文化的感性意義外，還在當今社會有實際功能，不應輕言廢置。

引發今次爭議的薛國強先生，以電車佔用中區路

面三成，是導致中區塞車的「元兇」為由，向城規會提出取消中區至金鐘之間的電車服務。筆者認為有關理據牽強，忽略了電車在繁忙地區有效疏導地面人流、減輕路面負擔的功效，並與地鐵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

港島區面積不大，商業活動、購物商場、娛樂餐飲、旅遊景點等主要集中在上中環至灣仔、銅鑼灣一帶，由於距離相近，擁有頻密班次和車站的電車在短途車程上更具優勢。不少打工仔中午外出用膳或送遞文件時喜歡坐一至兩個站電車，因為港鐵站與站之間距離太遠，又要上落十分不便。若取消電車，這批人可能會轉搭巴士或小巴等地面交通工具，勢將令中區路面更加擠塞。加上電車車費平、載客量多，路軌又與其他車輛共用，不似輕鐵般要獨佔，因此電車在繁忙商業區內可起到快速疏導短途人流的作用，有存在的必要。此外，薛先生認為港鐵與電車路線重疊，兩者電車可以取締；筆者認為這個說法顯示他並不了解電車與地鐵間互相補足的關係。港鐵的作用是快速傳送大量人流至遠方地區，而電車的作用則是補港鐵站與站之間的空白點，例如跑馬地，又或者給那些不趕時間回家的人另一個廉價選擇。彼此的顧客群不同，並不構成直接競爭，根本沒有「你死我活」的需要。

電車既承載了香港百多年的歷史文化，到了今時今日仍有實質運輸用途，是否應該取消它任何一段，相信市民心中自有答案。

看鍾庭耀的虛偽嘴臉

□李繼亨

【議論風生】

港大「佔中」〈帳目醜聞〉中，涉事的四名核心：陳文敏、戴耀廷、鍾庭耀、蔡寬量，其所作所為都已經嚴重逾越大學教職人員的應有底線，而經過港大管理小組的調查結論，四人早前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懲處。然而，醜聞主角之一的鍾庭耀，昨日撰文惺惺作態，以「翰林雅士」自居，自稱受到「莫須有」罪名，又將之與十五年前的事件相提並論，指桑罵槐，意圖推卸否認責任。其虛偽、奸狡的嘴臉表露無遺。

上周，港大校委會召開例會，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在會後指，決定接納中央管理小組跟進匿名捐款審核報告的全部建議。據傳媒報道，由港大校長馬斐森任主席的管理小組認為，在捐款醜聞擔任牽頭角色的戴耀廷須受到三項處罰，包括不准擔任管理層職位、不准接受捐款和不准監督研究員，時間長達數年。人文學院前院長蔡寬量則被指沒確保捐款用於指定用途，且沒通知人力資源部便把研究助理借調至民調計劃，面臨與戴相同的懲罰，但年期較戴耀廷短。同樣有份收受不得接受的港大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小組建議鍾在一段時間內不得接受捐款，但年期比戴和蔡更短。

即便是「管理小組」沒有這一結論，鍾庭耀在「醜聞帳目」的角色，早已曝光於公衆面前。他儘管掛着「民研中心」總監的頭銜，但在「佔中」期間卻與戴耀廷暗中互通資源，資源左手交右手，更是被指未有按規程與慣例處理捐款事宜。種種事實證明，鍾庭耀對「醜聞帳目」負有不可推卸的

引導青年理解歷史與現實聯繫

《明報》設「港聞」版和「中國」版，上述報道應當列入「中國」版，不知該報將其列入「港聞」版的意圖。既然列作「港聞」，就令人聯想香港青年如何對待抗日戰爭。同內地青年一樣，香港青年對於發生在他們

與人民相分的一面而輕視國家與人民相聯。如此立論，符合該報的自由主義立場，但是，偏離客觀和公正。有一種觀點：二十一世紀不同於二十世紀，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南京大屠殺師魏森林對《明報》記者說，「仇恨日本是教科書的事，而他非常喜歡日本，兩年內去了六次，只要一攢夠錢就去，「那裡制度又好、服務又好，化妝品比國內便宜一半，為什麼不去？」

香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屬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香港與內地邊界，不改變領土完整，不影響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中國籍香港居民是中國人民一部分。一國兩制下香港國公民享有不同於內地居民的權利，豁免若干內地居民應履行的義務，不影響國籍同一性。因此，「中國夢」必定也是「香港夢」。「本土論」和「港獨」只能是痴人說夢。

中國現代史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接着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造成中國山河破碎，3,000萬生靈死於非命，中國社會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之巨，中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創傷。

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近現代史，是一部向外擴張，不斷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有學者認為，以長達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武家文化為基礎，崇尚「戰爭富國」，無限抬高戰爭與「國家命運」的互動關係。構成了日本對外戰爭的軍事化的內在邏輯和性格特徵。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考察日本人的文化和心理特徵，不難發現日本民族及其人民具有許多非常特殊的素質。

右翼圖重溫稱雄舊夢

首先必須承認，日本民族是一個非常勤奮上進的民族，日本人民是非常認真努力的人民。世界上怕就怕認真兩字，而日本人是最認真的，與此同時根植於日本人心理性格中有一種恐懼寂寞、酷愛工作的習性，對於日本人來說，無所作為的空閒比死還難受，近代西方人文主義運動崇尚「不自由，毋寧死」，而近代日本人崇尚的是「不作為，毋寧死」。正是基於對空閒無聊的恐懼，只要有所作為（有事做），日本人便會不顧一切地努力，將工作做到最好（所謂「一生懸命」）。

責任。對於如此清晰的事實，他並沒有以坦承的態度面對，而是以各種方式意圖推卸責任。

在昨日這篇名為《亂世裡的禪祥》的「家書體」短文中，充分顯示其虛偽的一面。從未做過大學講師、助理或副教授的鍾庭耀，先是大言不慚地以「為師」自居，一方面稱要待大學處懲信正式到來才公開回應事件，但另一方面借各種理由去攻擊結論，意圖將事件朝「政治打壓」方向拉扯。文中還有意自比岳飛，暗指自己受到「莫須有」罪名，更有甚者，兩次直接與二千年他自己所涉及的學術醜聞相提並論，意圖以政治理由來逃避責任。整篇文章，看似是一封「家書」，實則是一封有如古代貪官自證無罪的可笑辯文。

圖卸罪責 惺惺作態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該文在文末稱：「國家將興，必有禪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但願你我的瘋狂、杏林的覺醒，以至所有翰林雅士的聲音，都是亂世裡的禪祥。」明明是捲入「醜聞帳目」、明明是在大學中央管理小組詳細調查後被證有過錯，到鍾氏手中「移形換影」，變成了一宗「政治打壓良知學者」的「政治大戲」。而鍾庭耀本人，也搖身一變，成了捍衛民主自由的「鬥士」、「良心」。真不知道鍾庭耀是否知道「醜」字如何書寫，如果有錯不認、有責不擔、有罪不罰，這是否才是他想要的結果？若真的如此，請鍾總監直接說出來，不必如此惺惺作態，造作之態令人作嘔。

紀念抗戰勝利 增強國家觀念

【政情觀察】

楊 堅

八月二十三日《明報》「港聞」版刊登一則關於內地一名「八十」後青年與其曾經親歷日本侵略軍攻佔南京的老祖母，二人對待日本的截然相反態度的報道。記者的報道語言是形象的：「喝用水用虎牌保溫杯，寫字拿起無印良品的筆，出門前開啓大金的空氣清新機，回到家打開三菱空調，睡前用資生堂的洗髮水洗頭，休閒時看日本動漫……」八十後」江蘇南京市民、前導遊沈玉（化名）向本報表示，她很喜歡日本的產品，也喜歡去日本旅遊。雖然她的祖母張靜（化名）是戰時日軍刺刀下的幸存者，一生都恨「日本人不是人」，但對於南京年輕人來說，大屠殺的歷史似乎已無法令他們抗拒現代日本的吸引力。」「正當當高調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年之際，接受本報採訪的南京青年卻說，他們不忘大屠殺的傷痛，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喜愛現代的日本。」該報道還引南京另一名「九十」後青年的例子稱：「體會屠殺造成的仇恨，對於『仇恨日本』更難。」「體會屠殺造成師魏森林對本報說，仇恨日本是教科書的事，而他非常喜歡日本，兩年內去了六次，只要一攢夠錢就去，「那裡制度又好、服務又好，化妝品比國內便宜一半，為什麼不去？」

出生前近半世紀的歷史事件的態度，同事件親歷者大相逕庭。由於香港被日本佔領的時間明顯短於內地的日佔區，內地同胞抗戰時間長於香港居民，所以，香港青年對待抗戰，同內地青年對待抗戰，也容易產生認知上的差異。特區政府特別規定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為香港公衆假日，同內地同胞一起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不僅是要幫助青年了解那段歷史，更重要的是要引導青年理解那段歷史與現實的聯繫。

因為親身遭受到日本侵略軍蹂躪而痛恨所有日本人，是一種偏見。記憶和助長這種偏見，不僅不是紀念抗戰勝利的宗旨，恰恰相反，是違背紀念抗戰勝利的意義。另一方面，如果因為眼前日本商品和服務優質，而忽視日本出現復活軍國主義的圖謀，則會產生嚴重後果。一個國家與其人民是既相聯又相分的。日本侵略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同當時日本主流民意分不開，此所謂國家與其人民相聯。日本侵略亞洲包括中國，同當時日本主流民意為一小撮日本領導人所操縱分不開，此所謂國家與其人民相分。國家作為一個一般概念包括領土、居民和政權，則國家與其人民相聯。國家作為一個特殊概念專指政權，則國家與其人民相分。正確的歷史觀和國家觀包含這樣兩層關於國家和人民關係的演義。

《明報》的上述報道，是帶有傾向性的，強調國家與人民相分的一面而輕視國家與人民相聯。如此立論，符合該報的自由主義立場，但是，偏離客觀和公正。

有一種觀點：二十一世紀不同於二十世紀，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南京大屠殺師魏森林對《明報》記者說，「仇恨日本是教科書的事，而他非常喜歡日本，兩年內去了六次，只要一攢夠錢就去，「那裡制度又好、服務又好，化妝品比國內便宜一半，為什麼不去？」

在日本國內已經出現反對安倍內閣修訂安法案的輿論時，我們中國青年包括香港的青年，怎麼能夠一門心思享受日本優質商品和服務？香港的媒體怎麼能夠助長那樣一種一心享受不問世事的態度？

中國夢必定也是「香港夢」

全球化抹殺國家界限嗎？否。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化勢如破竹相比，如今全球化正遭遇空前挑戰。世貿組織多哈發展談判名存實亡。雙邊和區域性多邊貿易投資自由化談判峰起。不同內涵的「本土主義」席捲多國（地）。民族主義成為各國對外戰略和政策的基石。全球金融經濟政治格局處於人類五百年來空前深刻全面的調整，核心是世界重心由過去五百年位於西方（歐美）開始向東方（亞洲）轉移。借用地質學術語，世界經濟政治板塊呈現大分裂大移動、國際關係的單元。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年，就是要溫故而知新，教育青年樹立國家觀念。就香港青年而言，國家觀念包括三點：國家領土和主權是完整的；中國人民是整體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歷史使命和命運是共同的。

香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屬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香港與內地邊界，不改變領土完整，不影響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中國籍香港居民是中國人民一部分。一國兩制下香港國公民享有不同於內地居民的權利，豁免若干內地居民應履行的義務，不影響國籍同一性。因此，「中國夢」必定也是「香港夢」。「本土論」和「港獨」只能是痴人說夢。

中國崛起須理智避開日本攻擊

——抗戰勝利70周年的反思

□鄭海麟

【神州點面】

今年9月3日，中國將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這自然是一個令全球華人揚眉吐氣的日子。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今年亦是甲午戰敗、馬關割台導致中國喪權辱國120周年，因而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反思的日子。

從近現代歷史上看，日本的確是對中國造成「創巨痛深」的國家。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日兩國同受西方列強的欺壓，之後日本經維新變法而崛起。可悲的是，它的崛起不僅未成為中國之福，反成為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大禍」的根源。日本人的可怕兼可惡就在於他們將西方列強套在自己身上的繩索解開後，反而將繩索套在中國身上。明治時代的許多軍豪、政客乃至思想家都一致認為，日本的富強需要以中國貧弱為基礎，它的民族優越感需要以中華民族受虐受辱為代價，它的國內危機需要通過轉嫁到中國來解決，它的國際地位需要犧牲中國來滿足。

日侵華造成山河破碎

令西方民主思想家頗感驚訝和費解的一個例子是，曾經鼓吹「脫亞入歐」「和魂洋才」，受西方文藝復興